

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刘再复 林岗·著

## 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刘再复 林 岗 著

责任编辑：朱 正 杨新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625 插页：2

字数：60000 印数：1——8750

ISBN7—217—00309—1

I·125 定价：0.85 元

湘人：88—2

## 目 录

一、序论	1
二、批判理性的成长	3
三、礼治秩序和主奴根性	16
四、解脱之道与阿Q精神	39
五、传统伦理学与私人本位性格	62
六、教化政治与面子问题	84
七、几点分析	97

的艰巨工程，即重新塑造民族性格。只要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没有完结，对国民性的讨论和反省就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整个转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五四”是一个觉醒的时代，那时先觉者们运用新的观念参照系统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国民的劣根性痛下针砭。他们的反思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的自觉”的思想文化高峰，他们坦率的自我反省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的努力。今天，正当我们痛感“人的现代化”工作进行得不充分，

## 一、序 论

国民性是文化烙于整个民族的性格外观，任何对国民性问题的真正思考都自然而然地与一定的传统文化相联系。文化塑造性格，性格映照出文化特性。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的国民性受到深切的关注和严肃的思考，它从人的角度反思传统文化，并通过这种反省开始“人的现代化”的艰巨工程，即重新塑造民族性格。只要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没有完结，对国民性的讨论和反省就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整个转变期里的一个重要环节。“五四”是一个光辉的时代，那时先觉者们运用新的观念参照系统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国民的劣根性痛下针砭。他们的反思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人的自觉”的思想文化高峰，他们坦率的自我反省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的努力。今天，正当我们痛感“人的现代化”工作进行得不充分，



## 二、批判理性的成长

对国民性的思考反省，标志着中华民族经过长久的苦难与挫折终于使自己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臻于成熟。虽然在“五四”时期这种批判理性获得最完整的形态和最充分的表现，但它并不始于“五四”，它既是传统社会危机的产物，也是中国和西方发生冲突之后，回应西方挑战过程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说，“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热烈而集中地反省传统文化和国民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因缘。

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结束了清帝国的闭关封锁状态，并导致了一系列的急剧变化。在这里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有两点：第一，西方对中国的一系列打击和渗透，包括军事、政治、外交、思想文化诸方面，大都以西方的胜利和中国的默许、接受和失败而告结束。这种强烈地显示出来的“生存优势”的悬殊对比，无情地宣告

一个事实：中国落后了。第二，中国和西方有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西方的渗透，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观察本民族文化的巨大参照系，就象有了一面镜子，可以面对着这面镜子，映照出自身的形象。意识到落后，意识到危机，并有了观察的参照系，便直接导致批判理性的觉醒。不论个人还是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永远自满自足，就不会去改变它。任何改变（包括思想和行动），都产生于主体对自身存在状态的焦虑和危机感。但焦虑和危机感并不能保证有效而深刻的反省，自我意识的深度还有赖于优良的工具。蒙上尘垢的镜子照不出清晰的形象；身处山中，就无法认识庐山真面目。近代中国的历史变化，恰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并促成它们的成熟。

中国和西方的交通和接触并非始于近代，但只有到了近代，中国才开始对自身存在状态作出了认真严肃的反省；而只有到了“五四”时期，这种反省才推进到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深度上。

远在明朝万历二十八年底（1601年），利玛窦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得到皇帝的准许，进京献上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和五洲图，据《利玛窦中国札记》<sup>①</sup>称：万历皇帝只对欧洲的

<sup>①</sup>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第四卷、第十二章，中华书局，1983年。

风土人情、婚丧宝物感兴趣，他对那张五洲图预示的世界交通接触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一点毫无反应。他同神父们的接触是间接地通过太监传话进行的。万历想见利玛窦一面，而终于没有行动，他派了两个画师画了两幅神父的身像。利玛窦此后在北京住了十年，但与万历皇帝从未谋面。万历帝坚持他的规矩，不在太监和妃子之外的人前露面，坚持他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开始的顽固的孤寂生活。利玛窦在北京进行的传教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的活动，也只引起徐光启、李之藻等少数上层士大夫的关注。十六世纪中叶，欧洲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活动，而利玛窦西来，整个大明王朝不过象一颗小石子投进一沟死水，泛起几丝涟漪而顷刻复归死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华，请求准许留人长住中国以“关照”贸易。乾隆敕谕断然拒绝，理由是：“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尔仰慕天朝，欲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礼法，与尔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学习，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sup>①</sup>从根本上排斥不同文化接触的必要性。鸦片战争以前，虽然欧洲进步日速，

<sup>①</sup> 见《清实录》1514卷。

中国传统文化于明、清两朝已呈萎缩衰落之象，但那时的中、西交通并没有使中国人感到危机，关起门来做皇帝尚属可能。由于这种历史条件的限制，无从促成对自己传统进行反省审视的思想潮流。

中国人开始自我反省，多少看到自己的弱点与落后面，是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才逐渐产生的。1840年以后，中国与列强直接军事交锋，进行了两次鸦片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洗劫京城，焚毁圆明园，清室鼠窜热河。这一系列的惨败导致了割地赔款和《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1851年洪秀全于广西金田起义，领导太平天国与清廷进行了长达十三年的激烈战争，连年的战火使全国首富的江淮地区满目疮痍。连续的挫败，内忧外患的局面，迫使一部分士大夫和官僚正视目前的困境，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在技术、器具方面落后了。他们反省的集中点落实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冀图以实力自强。《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年，魏源作《海国图志》，究索全球地理沿革，他在“原叙”中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则。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中，曾国藩、李鸿章等都直觉到“夷”的枪支火炮的利害，“实非中国所能及”

①，于是就要“资夷力以助剿济运”②，“师夷智以造炮制船”③。后来，张之洞把这种采用西洋技术、机器以至富强的主张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就是孔孟六经和传统典章文物制度，而“西学”就是“夷”的长技，即船坚炮利。在这个思想背景之下，产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这个运动的根本意向是实力自强，权采“洋鬼子”的长技以把“夷”逐出“天朝”的疆域，以恢复“我朝”的“德化”状态，依靠技术和实力向古老的传统回归。他们对自己的反省是非常表面化的，与几乎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口号“文明开化”相比，“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确乎浅陋不少。它拒绝承认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已经不适应世界潮流，仅仅把失败归结为军事、经济实力不如人，同时仅仅认为西方的长处只有“奇技淫巧”。“夷”挟持船炮这类魔术式的“奇技淫巧”侵犯自己的礼仪之邦。正是由于这样，他们贬称西方人为“夷”，办洋务又叫“夷务”，骨子里透着对西方的鄙视和自己的孤傲。也就是说，他们光从与列强实力较量的悬殊对比中，直观地看出表面的国力差异。至于如何产生出这种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2卷。

②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5卷。

国力差异，西方如何创造出强盛的实力，中国又如何未能使国强民富，他们并未深虑。国力差异遮盖下的关键性问题，都不约而同地被忽略了。因此，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时期的自我批判精神，是很不充分的，它过于直观而又过于表面。

十二 国门既然打开，西方势力和思想文化就不断渗透，这势必引起更多的思考和反省。甲午海战之前，人们对自己和对西方的认识就逐渐超出洋务运动的水平，象王韬这种西化程度比较深的知识分子，就已经主张学习欧美诸国实行代议制，开国会，准许言论自由。郑观应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作《盛世危言》，批评洋务运动，鼓吹议会制度，以图摆脱清室的专制统治。即使洋务派的首领李鸿章，也意识到传统伦理的缺陷，并在私下指出自古相传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五常伦理，已不适于“大地交通，国家种族之竞争愈烈”的时代，“吾之古伦理，愈不适应于世，而吾人犹泥之。此地方之所以不发达，邦国之所以日受人侮也。”他还看到西人以个人与邦国之关系为重，“此实吾国向者之伦理所不及也。”<sup>①</sup>这种新的眼光和思考批判精神，由于甲午战争的

---

① 《李鸿章家书》《谕玉侄》，页11，中央书店，民二十五年版。

惨重失败而大大推进一步。历史似乎是这样的：甲午的失败导致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又证明洋务思想有问题。先觉者们抛弃洋务思想，继续寻找真理。他们一致得出结论，中国在制度上落后了。

例如，1888年，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还只是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模糊主张，但在1895年5月至6月的接连三次上书中，就形成了包括改变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在内的全面变法设想。变法的核心内容是用君主立宪制代替皇权专制。其后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主张革命，以共和代替清室专制。虽然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如何改造中国的途径有分歧，但他们认为当时的制度已腐烂、需要改变是一致的。在他们各自的文章、论著中，详细地分析了旧制度的弊病，可以说维新派和革命派是殊途同归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对传统的自省意识主要表现在政制方面，针对中国落后的政制而提出改革的方案。康有为的旗帜是“变法”，所谓“变法”，即改变“成法”，改变既成的规章制度；孙中山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也表现了以三民主义为指导进行政制革命的思想。但两者都几乎没有注意到伴随政制的改变需要有一个思想、观念的启蒙，制度更新的同时需要有一个

“人”的更新。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比洋务思想要健全而深刻得多，这既表现在对中国的认识，也表现在对西方的认识。不象洋务派那样固守“中学”，不敢变法，他们敢于改变对社会进步而言是比较关键的制度，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学习，意识到西方的进步并不只是技术、实力，他们的文物制度也要比清朝统治优越。西方技术、经济的进步，关键由于他们有优越的制度。所以康有为要虚君，立制度局，搞君主立宪。而孙中山受到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影响创立“三民主义”，要搞民主共和。由此可见，自我批判意识的普遍高涨必然带来认识上的改变，而认识的深化又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反省是近代批判理性成长的第二个阶段。

但是，维新和革命的势力都遭到无情的失败，戊戌维新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终于以康梁亡命日本、六君子就义而结束。十三年之后的辛亥革命，也只是赶走了皇帝，换皇帝专制为军阀专制，共和的旗帜不过是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更为沉痛的失败引起更加深沉的思考，批判理性借着失败而更趋成熟，先觉者们再次被迫面对现实。戊戌维新失败后三年，梁启超作《新民说》。他痛省过去，超脱“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

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sup>①</sup>等等多带指责性的议论，发现官吏的不良与政府的无能同国民的文明程度很有关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丧权辱国的时候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唯有多反省自己：为什么没有文明程度高的国民？他得出结论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sup>②</sup>陈独秀于《新青年》1916年1月号发表一文，取名《一九一六年》，于新年来临之际寓除旧布新之意，他同样把人的自新摆在第一位。“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sup>③</sup>。陈独秀几乎重述了梁启超《新民说》的根本思想，不过说得比梁启超更沉痛、更动

---

①② 《梁启超选集》，页20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独秀文存》，卷一页43，亚东图书馆，民十二年版。

情。1907年，鲁迅作《文化偏至论》，批评晚清以来见物不见人的“武事”救国论和“制造商贾立宪国会”之说，主张兴邦国，其根本在于让人“发扬踔厉”。西方之富强，以实力炫耀天下，这只是“现象之末”，其“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sup>①</sup>。鲁迅这篇文章，从总结欧美富强之道的角度，鲜明提出人的自新问题。1918年，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之职，潜心于“孙文学说”，总结失败的原因，他也沉痛地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终于推翻满清，“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sup>②</sup> 这在于革命志士“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所以，孙中山针对“知易行难”的传统，反其道揭出“知难行易”的思想主张。从维新失败到五四前夕，来自各个方面的严肃思考，都一致认为中国的思想、观念落后了，人的文明程度落后了。思想、观念的落

---

① 见《鲁迅全集》，第一卷页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31年。

② 见《孙中山选集》，上卷页104，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后、人的落后，造成了戊戌维新的失败，造成了辛亥的失败，造成了海通以来丧权辱国的严重局面。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批判理性才真正成熟起来，它超越洋务思想要求的技术、器具更新的层次，也超越维新和革命寻求的制度，政治变革的层次，而进入观念、思想的层次，进入人的重新塑造所要求的精神世界全面改观的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是需要技术在、体制、观念这三个层次展开进行的，无所谓那一个重要，那一个不重要。但是只有批判理性发展到这第三阶段之后，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会进入健全的阶段。因为鸦片战争所宣告的是中、西冲突和竞争时代的来临，作为后进的这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未获得现代意识，批判理性并未进入思想、观念的层次，就不会真正地认识自己，也不可能真正地认识西方，于是就不能把握技术、体制层次的改革。象洋务运动那样，对西方技术文化进行机械式的割裂，用官商式的旧办法来搞近代工业，其结果不可能不走上歧途。或象维新和革命那样，离开现代的人去作体制的改革，也许制度的形式改变了，旧内容依旧保留下来；名字改变了，内面还是一样。换汤不换药。批判理性的成熟使历史进入一个辉煌的时期，一个全面启蒙的时期。

批判理性以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观照古老的传统，把那些不适应现代化的“国粹”拿出来解剖亮相，批评古老的传统文化，批评圣人和圣人之徒，批评国民的劣根性。所以，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对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是在鸦片战争以来批判理性逐步成长并达到新的觉悟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的根本任务是面向民众进行全民族的启蒙。理所当然，传统文化与国民性成为关注的焦点。

批判理性从萌芽到成熟，经过了六十余年漫长的岁月。这未尝不可以说长了一点，付出的代价也过于沉重。中国人总是在惨重失败之后才会产生有限度的觉悟，觉悟程度的高低也是与失败的惨重程度成比例的。小失败，则小觉悟；大失败，则大觉悟；举国危机，亡国之祸临头，才有根本的觉悟。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也许是一个不太善于吸取教训的民族。正因为这样，失败和批判理性的成长才结下不解之缘。这是我们通观近代批判理性成长时得出的看法。其次，每一次反省，不论深刻与否，都为历史贡献了新内容。有对洋务思想的反省，才有促成近代工业发展的洋务运动；有对维新和革命思想的反省，才有变法和革命；有对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反省，才有近代的启蒙和现代意识的确立。愈是深刻的自省，它所导致的贡献便愈有长久的价值。五四时期对国民